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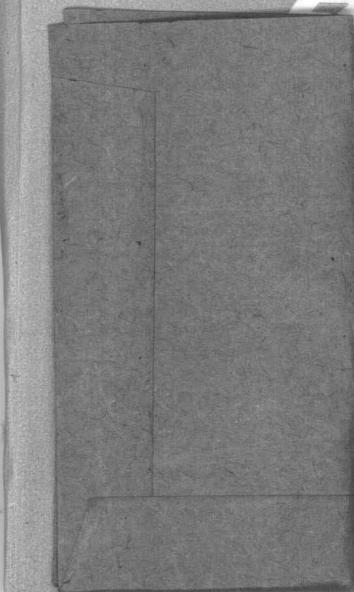
下

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 研究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
河南省经济研究中心 合编



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
研究



目 录

谈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新产业革命的对策问题

-于光远 (1)
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马 洪 (29)
劳动就业和劳动工资问题 冯兰瑞 (51)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 董辅礽 (67)
两项新的战略决策与农村建设 石 山 (99)
论战略的本质特征 邓英淘 (119)
论战略研究 邓英淘 (134)
人口战略 查瑞传 (149)
千载难逢的机会 迫在眉捷的挑战

——试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对我国的

- 启示 姚 琮 (174)
生产力发展规律问题 薛永应 (218)
商业发展战略研究 陶 珐 (251)
对解决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一些设想 赵海宽 (287)
农业现代化问题探讨 徐以达 (302)
我国工业布局的态势与战略对策 陈栋生 (326)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问题 梁文森 (344)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发展战略问题 梁文森 (367)
经济预测 毛立本 (386)
经济管理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 王宏昌 (405)
中观经济问题的战略意义 刘与任 (435)
基本建设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林森木 (459)
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制体系 杨承训 (468)
简论河南省经济区划方案 杜启铭 (500)
人才预测 朱 兴、杨 研 (518)

谈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新 产业革命的对策问题

于光远

今天共讲两个问题。一、关于战略和规划的一般性问题。
二、新产业革命和对策问题。

一、关于战略和规划的一般性问题。

大家用战略这个词有三年多的时间了，以前这个词用的不是太多。三年多以前在北京发起了一个战略座谈会。两个月一次，风雨无阻。一次开一天。前不久开了第十九次会议。当初提出讨论战略问题，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不讨论一些大的问题。大的问题用什么词概括比较好呢？假如说叫路线问题，就讨论不起来。因为过去我们把路线问题看得是很严重的，大概只有犯路线错误的时候，才提到路线问题。或者说到底什么路线是正确路线的时候才提到路线问题，路线问题好象不能提出讨论。战略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这个讨论起来比较自由。战略这个词本来是一个军事用语，后来把它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战略就是指一个全局性的谋划。战略问题也是可大可小的，大的全局性，就是大的战略，小的全局性，就是一个小的战略。所以大到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小到一个公社、一个企业都可以谈谈发展战略。这样讨论战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题目。

现在来谈谈一个地方的工作，在地方工作中我打算怎么做，

这是一种谋划。在谋划中不但要考虑许多具体谋划，还要想想全局性的谋划，大的问题的谋划。所以，战略问题讨论的意义就在这里头。那么，全局性的有所考虑、有所谋划，确定下来以后就要给它展开、具体化，这就到了规划问题上来了。一般说来，战略还是虚一点的东西，就是抓住战略的特点、战略的目标、战略的重点以及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到了规划，就要把它展开、再把它具体一点。总的说来，不管是战略、还是规划，都是指要做的一件事情的预先的一种谋划，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计划这个范畴。但它们还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计划可以分两种来说，一种是古代意义上的计划，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计划。什么是古代意义上的计划？比方说，中国古代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者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或者“千方百计”。这些就是古代意义上的计划。就是做事情对将来总是要有一点预计，有点筹划，这就叫做计划。

现代意义上的计划，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有组织的生产。它同小生产不一样，这就要求对活动有所计划，我还没有来得及请教对欧洲文字有研究的一些同志，我只翻了翻外国的字典，英文 *plan*（计划）同 *plane*（平面）这个词大概有关，作设计，比方说要画一张设计图，就往往要画一张平面图。因此，我琢磨计划这个词就是从平面演化而来的。办一件事情要画一张平面图，也就是要搞一个设计，这就比古代意义上的计划更科学了。从资本主义开始，就有了计划，这种计划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必须是有组织的。因此，也就要求有一种现代意义的计划，与其相适应。

过去我们常讲，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是没有计划的，这句话恩格斯就表示过不同意。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专门有一段批判《爱尔福特纲领》作者说资本主义没有计

划。恩格斯表示不同意这个看法，也就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还是有计划性的。因此我们应该说有两种计划性。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个计划，资本家办一个工厂不能没有计划。同时，资本主义的计划也还是建立在一般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因为资本主义搞计划要用自然科学，一般的管理科学，比如用电子计算机，等等。所以，它还是有计划的。但是，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私有制发生矛盾，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或一个垄断组织，或者国家干预的一些部门，它可以做计划，但整个社会由于私有制，把它割裂开来了，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斗争，使整个社会不可能有计划。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计划性，这种新的计划性，不仅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一般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而且还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矛盾得到解决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有两种计划性，这种说法，要比说资本主义没有计划性，社会主义有计划性，要准确一些。

划分两种计划性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可以这样考虑，如果我们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得不好，如果我们一旦科学技术掌握得不好，在这方面我们的计划性可以不如资本主义。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某些计划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做到的。比方说吧，我们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来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到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已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计划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以改造，这点它就做不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它来说是不可超越的，超越了，就不叫资本主义了，就等于自己否定自己了。所以，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在我们的组织性不好，一般科学技术掌

握得不好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些方面可以不如资本主义的计划。但是，一定要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些方面的计划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永远不可能有的。

对我们的计划性和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可以做这样的区别：我们的计划性是全社会的计划性，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是欠缺的，他们计划性是被私有制所分裂的，而我们可以从全社会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好，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做到。当然，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候也讲全社会利益、人民利益等等，但它本质不是这个。

由于有了上述区别，所以，我们的战略、我们的规划，即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全局性的谋划就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

我们的战略叫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意思就是经济和经济以外的社会发展战略。因为经济也是社会呀，不能说经济发展就不是社会发展，所以叫做经济社会发展，意思就是：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我们仍然要继续突出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战略叫做社会发展战略，当然不错，但用这样一个概念，就把经济不突出了。如果光讲经济发展战略呢？就把经济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又忽视了。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意思准确地说，就是经济和经济以外的社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也就是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以外的其它的社会生活和其他的社会关系。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省略词，如果把省略了的字都补充进去，那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及经济以外的其它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这里就有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的认识问题。我历来对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张说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发展的规律，不应该加按比例这几个字。因为按比例发展只是有计划发展中一

个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的有计划发展跟按比例没有关系。比方说我们有计划地进行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按什么比例呢？在这里没有按比例的问题。还有我们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这是按什么比例呢？所以，有计划发展的意义是比较宽的、比较全面的，有计划按比例只适用于经济领域里一个方面的问题。把国民经济生活中有计划地发展，说成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等于把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有计划发展的问题搞得狭窄了。就是把部分的规律当成了一个全面的规律。从一九五六年我就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我们提经济社会发展，我认为有必要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真正有计划地发展，不能只局限在生产方面按比例的问题，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计划工作，由于过去受有计划按比例这个框框的限制，有许多问题没有在我们有计划发展这个事业之内。比如说，有计划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去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列到我们的计划里边去。还有搞城市规划，就是全中国地图上，到底哪些点应该建立城市，定这些点都应该有些什么方针，这些都是建立城市的规划，而不是已经有了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工作中有两条，一条叫定点，一条叫方针。我们建国三十多年了，我还没有看到全国有一个建立城市的计划。到底全国哪些地方应该建城市，这个东西也不是按比例的。生产力布局、生产力配置，也不是按比例的问题。是属于空间的安排。在搞规划的时候，我既要把按比例的问题考虑进去，还要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考虑进去。这个正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全社会的有计划地发展。这是一个方面的特点。

另外一个方面的特点，就是战略或规划的目的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这样一种目的，是我们社会主义战略、社会主义规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有些人或者一些善良的学者也这么讲，但这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不可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家要这样说，那是为了骗一骗人民，给人民一些安慰罢了。而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才真实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从这个出发，在搞战略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有时我们表述一个战略目标的时候，不一定把这个都写得很清楚，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还必须是为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人民的幸福。比如十二大战略目标的提法：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认为这个提法同历来会议文件的提法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战略目标就是简单地超英赶美，或者翻番。这次在表述目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前提：就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我觉得加上这句话，是表示我们重视历史经验，表示过去只追求产值的那种思想得到了纠正。今天因为我们的干部除了产值以外，别的统计指标还不熟悉，不讲产值就好象没有具体的、数量的概念。但是，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特别加上一个前提，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对“经济效益”这四个字怎么解释呢？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人民能不能得到实惠。人民最后得到的经济效益的多少，就是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志。比如说，波兰与匈牙利相比人均产值要高，为什么匈牙利就比较平稳，而波兰就不行呢？因为波兰的产值虽然高了，但人民没有得到多少实惠，生活有困难。人民不是要看统计数字，人民所需要的是自己的生活得到实惠。所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就包含最终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这四个字现在讲的比较多，但在干部当中把这个问题讨论透彻、理解透彻，似乎还要做一点工作。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当事者的经济效益；一种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就是说经济效益有一个当事者在谋取、在接受的一种经济效益。比方说工人干工作取得报酬，报酬就是他的经济效益，有这

个工人在谋取，有这个工人在接受。农民也是这样。当事者的经济效益除了看他们的收入，还要看物价，看最后得到的实物，或者叫实际收入多少。企业也是个当事者，企业经济效益要看企业在缴纳税利，支付工资之后，还能留下多少可供企业支配的财富。国家的财政部门也是一个当事者，他的经济效益是按照制度、按照计划、预算能取得多少财政收入，并且按照计划、预算来使用这些财政收入。因此，每个经济效益都有当事者在谋取、当事者在接受。

可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就没有当事者，谁是全社会呀？没有一个全社会来收钱的。但全社会经济效益是客观上存在着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客观的全社会利益在里边。将么，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当事者的经济效益中间有这样一些关系，当事者的经济效益是全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如果没有各个当事者去谋取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全社会经济效益是许多当事者经济效益的综合。反过来，各个当事者的经济效益，也是全社会经济效益的分配。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没有当事者，但有个代表者，如果没有代表者，谁给全社会经济效益说话。要有个代言人，要有一个掌握全社会经济效益的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全社会经济效益和所有当事者经济效益的代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既应该经常给全社会经济效益说话，也给各个当事者的经济效益说话。而且，也应该让各个当事者了解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主张将来理想的建设项目的经济论证，应该既论证当事者的经济效益，也论证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在确定一项工作的时候，把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写上去。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考虑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到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这是经济效益问题上的第一个问题。

经济效益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之

上，还要有一个最终社会效益。因为各种经济效益会有矛盾，最后来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应该有一个最终社会效益。比方说，搞生产的人要求有生产效益，搞环境的人就要求环境效益。那么，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还不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环境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两个发生了矛盾怎么办，比如说强调环境，成本高了，或者强调成本，环境破坏了，这两家打起官司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怎么样来解决呢，就得请出最终社会效益出来说话。只有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最终经济效益得到最恰当的结合，才能体现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特点。经济效益一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怎么用最小的劳动，获得同样的效果。这不是一个社会关系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十二大目标提出翻两番，有经济效益这个前提和没有这个前提是大不一样的。有前提和没有前提代表了两个时代，表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是有理解，还是没有理解。战略问题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谈这个战略，谈那个战略，最后问您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略、是一个什么战略，常常就回答不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有一个高度的概括。比如讲社会战略，这就要把特点概括出来加以说明。我们的战略是为了人民幸福的战略，这跟仅仅为了统计数字上的战略就不同。

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建设速度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是坚持高速度，不能认为高速度就是高指标。真正的高速度不是靠高指标能做到的，要实现真正的高速度，要靠能实现高速度的具体办法，而搞高指标往往不能达到高速度。

我们搞计划、搞预测常常是不准确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复杂，特别是人的因素是很难估计的。如果仅靠死米，计算物的因素，往往是估计和实际差得很远。比

方说：在实行三中全会农村政策前，有谁能想到执行了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可能有的同志预测到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我看了数目字以后，才知道从1952年至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7%，可是从三中全会以后每年的劳动生产率也增长了2.7%，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就等于以前的26年的增长速度。因此，有些东西是没有预计到的，而把没有预计到的东西写到计划里去也是不慎重的。计划只能写我们能算得出来的，能够预计得到的。计划是准备超过，而且是准备大大超过的。所以，我们的速度的确是要算一算。我主张小学生、中学生数学课里都作一个题目，假定发达国家每人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元，我们是多少元，假定我们是用什么速度发展，发达国家是用什么速度发展，多少年后我们的差距不再扩大，多少年后我们可以赶上。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我希望所有的初中学生、高中学生都做一做。这有一个好处，使他们知道什么叫速度、什么叫做赶上、什么叫做水平。我看算这个题目就是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因为过去不算，很多人很盲目，认为我们用现在的速度就可以缩短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其实不是这样子。假定一个国家每人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美元，假定增长速度是1%，这样每人每年就可以增长100美元。要与他们保持等距离，那我们的增长速度必须是多少呢？要增长40%。我们如果增长不到40%，那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就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增长1%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我们尽管拼上老命，增加40%是做不到的。总的结论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这一点应该明白，但如果我们的速度能一直保持比他们的速度快，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赶上并超过他们。这样一种简单的算术题，我想，大学生、初中学生、高中学生都应该算，高中学生应该算的复杂一点，初中学生算的简单一点，都要有一个观念：中国生产力落后，可能赶上外

国的时间会拖得很长，但我们只要持续高速度，总有一天可以赶上发达国家。除了中学生之外，我想所有的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都可以算一算这道题。

战略目标问题，三年前我们开始讨论时就提出来了。外国有一些学者说，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两种战略，一种是简单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战略，一种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战略。那时有人介绍美国的卫生组织，ASHA指标，后来和我们的指标重合。比如把其它指标加进去，人的平均寿命、就业率、婴儿死亡率等，把这些都放在我们总的计划指标里边去，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外国用综合指标计算，来代表必要满足的程度的指标。而把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也列为一个方面算进去。所以，全国性的战略就有这样一些问题，地区战略、各个部门的战略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前一段跟北京市的同志商量好了，我只要不出差，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每星期六要去看北京市的一个县，或者一个区。我提出这个计划后，到过海淀、丰台、延庆、平谷、密云。比如说到海淀区去，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我跟他们讨论海淀区的战略问题。海淀区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一个县的规模吧？这个县集中了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的最高学府。中国科学院在海淀区，农村方面，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林业科学院、林学院也在海淀区。工业方面有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铁道学院、邮电学院，都在海淀区。综合大学有北京大学，财经管理方面有人民大学，群众团体有中国科协……，一个县有这么多的学府，在战略上应不应该有它的特点。海淀区区委的同志们说，他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准备在海淀区发展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我觉得知识密集型还不足以表达这个区的战略。没有这么多学府也可以搞知识密集型，它用不了这么多高等学校，因此这样还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建议他们每两个星期找各个学校有见解的人开一次座

谈会，听听他们对海淀区有什么意见。我给他们讲河北省的正定县，县委书记出了一个主意，要一个大队到西北农学院去要求帮助。这个大队的农民到了农学院一讲，说希望你们那里有什么好的农业科研成果可以推荐给我们大队去发展生产。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朴实的农民感动了西北农学院，就给这个大队找了一个最适合发展的项目，回来后那个大队生产就搞得很好了。正定县委书记就号召每个大队都各自去找一个高等学校。这是他们正式做了决定的，跑的结果我还不知道，我就跟海淀区的同志讲，正定县连一个中专就没有，他们就这么重视高等学校的力量，你这么多的高等学校在这里，怎么发挥他们的力量。比方说，高等学校、研究机关需要做中间试验，这个地方能不能做为中间试验推广的一个特别基地。人家需要，你可以去帮助推广，发展成学校科研机关的延伸。干这件事哪个地区也没有你方便。还有发展旅游。广东组织了一个农民旅游团，要到北京去，提出的要求住北京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饭。农民想过几天阔老爷的生活。农民有钱，只过几天，又不是天天过。这个建议信北京市还没有答应，说我们的高级宾馆，外宾很多，不好安排。我给北京市旅游公司的经理谈，这是新闻可以登报的呀。中国农民住高级宾馆，高级饭店，这是新鲜的事。南宁三月三日对歌节时，有一个农民旅游团在南宁。我跟海淀区的同志讲，你们在战略中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思想，把海淀区的老百姓变成全国最有文化的老百姓。因为这么多学校在他那里，做高等学校的附属，新的技术可以先掌握，而且参加试验。另外，也可以派旅游团出去。“四季青”、“玉渊潭”的农民也很有钱的，派一个旅游团到上海，派一个旅游团到广州、深圳，派一个旅游团到西双版纳，这些人回来后就可以作报告，首都的农民应该了解全国的情况。我到北京一些县去走走感到还是有点意思。比如到平谷县。平谷县这个地方，无论怎么着，北京的工业不应该安排在那个地方：交通不是特别便

利，资源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条件，工业不发达。我给他们提了个意见，他们很感兴趣。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干脆就不发展工业了，就搞一个无污染农产品区，宣传吃这个地方的农产品不用害怕，我这里没有工业。现在吃东西有污染没有污染人家很不放心。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污水站，根本没有作化学处理，只简单沉淀一下，就把水浇大米了，那里的大米含汞量超过了指标很多、很多，叫做“汞米”。老百姓不吃这种米，用它跟城里人换粮。所以，我说你们平谷县干脆搞一个无污染的农产品基地。将来我们的政策可以变一变，无污染的粮食价格应该高一点。后来我又到了密云，密云的同志说最应该搞成无污染区的应该是我们密云。因为密云水库周围是不允许盖工厂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们的县长是在北京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的，他们那里的玉米治虫都是用“赤眼蜂”搞生物防治，不用农药。我说你们搞无污染的农业的战略目标我也赞成。

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抓住这些特点。密云、平谷的思想基本上通了，准备不搞工业了。所以，战略这个思想要让人家一听就觉得是有特点的。现在，传统的战略观点还是比较普遍，一个变化的新的战略思想在酝酿。我们在西双版纳搞合作，研究这个地区的开发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先写一本书，叫做《西双版纳》，副标题是：“对这个地区一个国土经济学的考察”。要求他们写 40 万字，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要求进行讨论，然后修改。这本书就是探讨开发西双版纳的战略思想。我们把书写好了，再搞西双版纳的规划。我们研究西双版纳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小（一共只有 60 万人口），这对问题容易摸透一些。另外，这个地方比较有名，因此这个东西搞出来会有一定的影响。

上面讲的是战略，现在接着讲规划。规划比战略要具体一些，因为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设想，能够给人们一个指导思想。而规

划要展开。规划只是一种未来研究，这种未来研究可以叫做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就是说这个未来研究不是一个观察性的，这个未来研究是把努力包括在内的，不是不包括努力。这个与我们对日本的未来研究不一样，我们不是日本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当然不可能对日本作一个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对日本我们只能做一种观察性的未来研究。对于我们自己则要做规划性的未来研究。规划性的未来研究本身，还要用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加以补充，光是一个规划性的未来研究还不能解决问题。我是想用三种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来补充规划性的未来研究。第一种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叫做机会性的未来研究，就是要探讨在规划期间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机会。比方说，现在某项科学技术正在进行研究，有可能突破，或者已经取得了成果，我们有可能去掌握，有可能学到，但也可能学不到。有可能他的研究成果要失败。但是，我们不能不去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好处是，可以锻炼我们的敏锐，作好准备，一旦出现这个机会时就可以抓住了。不做这个研究，机会来了也抓不住。所以，做机会性未来研究很重要，单靠规划性未来研究是不行的。

第二种非规划性的未来性研究叫做警告性未来研究，因为我们不能把事情都看得那样顺利，要研究在我们规划期间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什么。这既是预料之外的，也是预料之中的。如果完全预料之外，那也无法研究。例如我们不能预料到哪天另外一个星球和我们地球相撞。我们也不必做这样的研究，但是，有些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发生水灾、旱灾、地震，气象也可以做远期的预测。中央气象局的同志对九十年代的气候有些耽心。在规划里不能把灾害都规划进去，但也要有准备。危险除自然方面的，也可能有社会方面的，如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等。

第三种非规划性的研究，我主张叫做评价性的未来研究。就是说也让一些人站在旁边对我们的规划进行研究，进行评价，看

到底能不能完得成。也就是说树立一个自己规划研究的对立面，让一些头脑清醒者专门去评价。

规划应该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规划，我对规划的理想是什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理想的规划、规划的理想”。我说规划的本质是什么呢？规划的本质是理想，我们理想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把遥远将来的事情看成是现实性的东西是过去“左”的思想的一个表现。遥远的理想很重要，因为人要有一个最后的奋斗目标。但是，我们光有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足以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足以充分地鼓励人们前进。所以，要有更加具体一点的二十年以后的、三十年以后的、四十年以后的、五十年以后的理想。我们一些报告里提出的目标也是一种理想。那么，应该把这种理想进行科学的说明、科学地描写、科学地分析，这样我们的理想才是科学的，这个就是规划。所以，列宁搞电气化计划的时候，就把电气化计划叫做“布尔什维克第二个纲领”。列宁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科学家主持，由他主要负责，集中了一批科学家，在二十年代就编出一个全苏维埃电气化计划，一共是50多万字，一本书。这本书我们电力出版社出版了。出版这本书是程子华同志的功劳。他要找那个电气化计划找不到，最后发现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有这本书，他就组织电力科学出版社把它翻译出来了。当时列宁要求苏联所有图书馆都要有这本书，所有干部都要学这本书。这本书在我们国内可能很少有人注意。以后斯大林搞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根据的材料，就是列宁的电气化计划。所以，程子华同志有点报不平，提出不能叫做斯大林五年计划，应该叫做列宁斯大林五年计划，是列宁在打仗的时候就抓的，以后斯大林把它变成一个具体计划。

规划就是一个理想，把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可能性描绘一